



鍾惺《隱秀軒集》與朝鮮黃汝一 《海月集》比較研究

簡錦松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提 要

韓國古代名賢都精通漢文，朝鮮的年代與明清兩朝的年代大略相當，其國人之著述亦不減於明清，值得吾人重視。本文以〔明〕鍾惺《隱秀軒集》，與〔朝鮮〕黃汝一《海月集》進行比較，希望從中找到比較研究韓中文集的方法學。

鍾惺和黃汝一卒年代接近，二人同樣由進士出身，都享有文名，而且，兩家文集的卷數，如分別比較明人及朝鮮文集表現的話，其比例也很接近，從這三點來說，鍾、黃二家文集，確有取以比較的條件。

關鍵詞：鍾惺、隱秀軒集，黃汝一、海月集、袁宗道、明人文集、韓國文集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sing Chung's "Yin-hsiu-hsuan chi" and Juyi Huang's "Hai-yueh chi" from Korea.

Chien,Chin-Sung

Professor , Chai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Nn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Virtue people in ancient Korea all mastered in Chinese, and the quantities of their writings were no less tha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are roughly at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Focusing on this similarity, I hope I can find a method of comparing Chinese and Korean corpus through examining Hsing Chung's "Yin-hsiu-hsuan chi" and Juyi Huang's Hai-yueh chi.

The birth and death time of Hsing Chung and Juyi Huang are identical, and they were both well-known in the literati class. Besides, the amounts of their works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Above



these three reasons, there are certainly some conditions for both Chung and Huang's corpus to be compared with.

Keywords: Hsing Chung, Yin-hsiu-hsuan chi, Juyi Huang, Hai-yueh chi, Tsungtao Yuan, Ming corpus, Korean corpus.



一、前言

韓國在近年內出版了大量的古代文集，最主要的兩部大書，一為韓國古典翻譯院精心出版的《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正集 350 冊，續集 90 冊（未完），一為韓國景仁文化社影印發行的《韓國歷代文集叢刊》三千冊，這些文集中記載了豐富的環中國海周邊國家的先代文獻資料，不過，台灣的學者很少注意及此，引用和專門研究的人都不多。

本文嘗試以知名的鍾惺《隱秀軒集》¹，與朝鮮才子黃汝一《海月集》²作一比較，希望從中找到比較研究韓中文集的方法學。

為什麼選擇鍾惺和黃汝一，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因為他們的生卒年代接近，鍾惺（1574-1625），年 52 卒，黃汝一（1556-1622），年 67 卒。第二，兩人都曾中進士，鍾惺在三十七歲時，中萬曆 38 年（1610）進士，黃汝一（1556-1622），二十一歲中司馬試，萬曆 12 年（1584）乙酉，三十歲對策登乙科，³ 選入翰林。第三，作品的卷數接近，《海月集》14 卷，《隱秀軒集》30 卷，乍看二者似乎相差懸殊，但韓國文集大部分卷數都不多，《海月集》14 卷的分量，屬於中等，《隱秀軒集》30 卷在明代文

¹ [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² [朝鮮]黃汝一著，趙昌來標點，吳虎泳監修：《海月先生集（簡稱海月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即韓國古典翻譯院前身，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集，2005 年），冊 10。

³ 對策乙科是唐代科舉術語，此借唐代科舉名義，指黃汝一考中進士。對策又稱射策，典出《晉書》卷 51，頁 1423，〈摯虞傳〉，唐人於制詔應舉或進士應舉，皆用射策一詞。乙科指進士試，〈新唐書·韓休傳〉（126：4432）：「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又見於杜甫〈八哀詩之六-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詩：「射君東堂策，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



集中也屬於中等數量。因此，選擇二者來作比較，可謂恰當。此外，文中也兼及譚元春《譚元春集》⁴及袁宗道。譚元春（1586-1637）與鍾惺同為竟陵派領袖，有兼顧的必要。袁宗道則因姓名事跡見於《海月集》，因而並記其人。⁵

二、從文集看作詩趨向

明代文壇主要意見的歧異，往往可以很具體地從各人的文集結構中，發現一些有規則性的區隔。拙著《明代文學批評研究》一書中曾處理過這個問題，也曾舉出了許多主要文集為證據，提出了一些很明確的規則。⁶

下文中，將從文集結構切入，簡要地析論兩人的文集表現。

1、《海月集》詩

《海月集》分為詩和文兩部分，第一卷至第四卷為詩，第五卷至第八卷及十三卷為文章，第九卷至十二卷為出使北京的燕行日錄，其中第九卷為詩，餘為經辦事件之文書及過程實錄。第十四卷為附錄，錄海月翁生平資料。

《海月集》詩的編次，沒有使用分體方式，而是採用了編年方式。詩的體裁中，七言絕句和七言律詩佔了大多數。第一卷到

⁴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⁵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號玉蟠，又號石浦，萬曆17年（1589）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期滿入翰林院為編修，官至太子右庶子。著有《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今人錢伯城標校本）。黃汝一也被選入翰林，兩人這一段履跡相似，但袁宗道的壽命短，登第之後都在館閣之中任官，黃汝一的居官履歷比袁宗道多，兩人的一生變化非常不同，因此，在本文中雖然談到袁宗道，但沒有以他為文集比較的對象。

⁶ 見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第四章復古派〉〈二、由詩集結構論復古派與臺閣蘇州之異同〉，總頁188-202。



第三卷，都是這兩種體裁，五言古詩雖有，但數量極少。第四卷收錄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以及五、七言轉韻體。⁷

詩體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排	七排	五絕	七絕	五轉	七轉	合計
數量	18	8	153	238	2	2	35	312	2	7	777
百分比	2.3%	1.0%	19.7%	30.6%	0.3%	0.3%	4.5%	40.2%	0.3%	0.9%	100%

上表中，七絕和七律數量不但多，而且和其他詩體比較時，比例相當懸殊。這種文集結構，屬於非復古派的類型，與臺閣體及蘇州文苑的詩集特徵，較為相似。

不僅在體裁選擇方面，也包括作詩的方法。復古派因為講究「取法乎上」，所以他們的五言古詩，有相當大的比率傳承自漢、魏、晉的三代，那些作風，單從詩句的文字表面就可以判斷出來，不過，在黃汝一的詩中，並沒有漢魏和晉人的風調。

他的五言古詩的作法，較常取法於唐人，尤其是杜甫。五言古詩喜用長篇是杜甫的重要特色，五言排律也是，這兩點黃汝一都擬用了。譬如：五言排律的題目中帶有「若干韻」字樣的作法，熟見於杜甫詩中，杜甫詩凡排律必在題目寫下「若干韻」。《海月集》中，像〈溫井感舊十韻〉一詩，⁸即用杜法，此詩平仄對仗的體勢都合，只有兩個字的平仄略有出入。至於〈燕館次月沙書

⁷ 轉韻體，指所押韻一再輪轉，句中則寬泛地遵用近體詩平仄律的一種詩體。六朝時，五言樂府長篇偶用此體寫作（如西洲曲），至唐初，七言轉韻體成為流行格式，一般題目或樂府題目，皆可使用七言轉韻體式。至杜甫以後，一般題目之詩漸少用七言轉韻體式，成為樂府題所專用。五言轉韻極少見。

⁸ 《海月集》，卷4，頁2下，總頁72。



懷韻排律五十韻》，⁹與杜甫的〈夔府書懷四十韻〉題目有相似之處，又如歌行體的〈風雨白屋歌〉¹⁰，也明顯出自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又如：〈次月沙早朝大明宮韻〉¹¹，宛然是盛唐人的聲口，連題目都摹擬了盛唐諸人的〈早朝大明宮〉，一字不變。明代的宮殿當然不稱爲大明宮，這裡不但以聲調仿肖唐人，連題目也利用「用典」的原理，仿製唐人詩題。

這些出現在黃汝一《海月集》裡的文集特色，也接近明代李東陽《懷麓堂集》的表現，¹²李東陽，號西涯，自翰苑出身，曾入爲內閣大學士。值得注意的是，黃汝一的前輩師長中，他最親近的柳成龍相國（1542-1607，曾任領議政），晚年退居洛水，臨洛水建「遠志堂」，自號西厓。遺集有《西厓先生文集》二十卷。¹³柳成龍不僅其號爲西厓，與李東陽相似，二人居官履歷，也頗相似，柳成龍在朝鮮爲文壇領袖，也與李東陽相似。黃汝一受其影響，非常明顯。

由上所述，黃汝一的時代，正是明朝復古之論盛行，舉國摹仿李、何、王、李若癡若狂之際，而他的文集卻沒有受到復古派的習染。究竟是因爲他個人有意識的遠離復古派影響，還是因爲地域相隔而沒有受到影響，遍察文集各卷，都沒有談到。但是，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成名在1506年左右，約早於黃汝一出生前六十年，王世貞（1526~1590）、李攀龍（1514-1570）也成名在黃汝一出生前二十年，李、何、王、李影響於中國甚大，詩文壇佔早已有前七子、後七子等稱號，以朝鮮與中國的關係密邇，每年信使往來，民間商賈不絕。再從黃汝一〈銀槎日錄〉來看，他記載交接拜會的官員，對每個人的履歷籍貫職稱都書寫明白，對朝廷的人事變化，也十分敏感地察知。而

⁹ 《海月集》，卷9：19下，總頁143。

¹⁰ 《海月集》，卷4：12上，總頁77。

¹¹ 《海月集》，卷9：17下，總頁142。

¹² [明]李東陽撰：《懷麓堂集一百卷》（臺北：臺灣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0冊，1983）。又，周寅初點校《李東陽集》，1984。

¹³ 又有《西厓全書》見《奎章閣韓國本圖書解題·續集》，頁421-422。



且，柳成龍相國尚且與李東陽同號西涯，如謂黃汝一不知道李、何、王、李和復古派的文學潮流，應非事實。那麼，黃汝一未受到復古派的習染，究竟是什麼緣故？在文學史上有什麼意義，值得後來的學者作更進一步的探討。這應不是黃汝一個人的論題，還可以從朝鮮詩文壇佔作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還有另一件事，黃汝一的一生中，遭遇倭寇之亂，始於萬曆 20 年壬辰（1592）夏，倭寇攻入王京，終於萬曆 26 年戊戌 7 月 17 日（1598 年 8 月 18 日）豐臣平秀吉死後，¹⁴於十一月間渡海敗歸，¹⁵前後七年，國家殘破至極，人民喪亡甚眾，黃汝一則正值 27 歲到 33 歲的青壯之年。以黃汝一在〈銀槎日錄〉中對滿州撻子的觀察仔細，以及他在亂後出任永川、昌原、東萊三府郡守時的關懷人民，屢見書奏，如甲午歲〈上西匡柳相國書〉（萬曆 22 年，1594），辛亥歲〈上白沙李相國書〉（萬曆 39 年，1611）¹⁶所談都是如何撫字救傷的治民實務，沒有絲毫空談，但不知道爲什麼，在《海月集》的詩中，很少看到書寫亂離的題材。如前所說，《海月集》受杜甫影響，非常明顯，那麼，黃汝一也許應該像杜甫一樣，杜詩充滿了安史之亂的悲愴，汝一詩中也應該找到倭寇之亂的悲歌。事實不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在黃汝

¹⁴ 豐臣秀吉卒日，據《明史》，卷 320，頁 8298，〈朝鮮傳〉云：「是月（十月），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七月九日（1598/8/10）平秀吉死，各倭俱有歸志。」。相差數日，又見《明實錄》，卷 328，頁 6073，〈神宗萬曆 26 年 11 月〉條。

¹⁵ 黃汝一記載倭寇渡海撤歸之事，見《海月集》卷 10，頁 14 下，總頁 154，11 月 28 日己酉（1598/12/25）：「晴，留義州。...千總高梯自邢軍門處馳來，言曰：西路劉兵進圍行長，東路麻兵亦進迫清正，次次渡海遁去云云。七年相持，今得吉報，不勝喜躍。」劉兵即劉挺軍，麻兵即麻貴軍。又見《海月集》卷 10，頁 19 上，總頁 157，12 月 15 日丙寅（1599/1/11）：「彥華又聽得萬經理軍夜自稱，本月初七日自王京離發。仍問倭賊有渡海聲息，然乎？答曰：釜倭已盡撤去，我三大將領軍馬前進釜營云。」，文中萬經理，即萬世德，萬曆 26 年 6 月丙子，萬世德自巡撫天津僉都御史改為經略朝鮮軍務，《明實錄》稱為「朝鮮經理」。軍夜，即軍吏。

¹⁶ 二書載於《海月集》卷 6，頁 1 - 15，總頁 87 - 94。



一的詩中最常見到的兩大主題，一是鳴國家之盛，一是好隱樂退之思，這兩點也就是明代臺閣體的總體風貌，也就是說，黃汝一的詩風相似於明代上層士大夫的一貫形象。

2、《隱秀軒集》詩

相對於黃汝一的《海月集》沒有復古派的形跡，一向被認為反對復古派的鍾惺和譚元春，他們的詩文集卻有完全相反於一般認知的表現。鍾惺的《隱秀軒集》和譚元春的《譚元春集》，都有明顯的復古派詩文集特色。

《隱秀軒集》42卷，其中詩占了14卷，這14卷中第1卷是四言詩，第2至4卷五古，第5卷七古，第6至9卷是五律，第10、11卷七律，第12卷是五言排律及七言排律，第13卷是五絕及六絕，第14卷是七絕，其數量如下：

詩體	四言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排	七排	五絕	六絕	七絕	合計
首數	4	116	35	285	107	61	1	17	2	94	722
比例	0.6 %	16.1 %	4.8 %	39.5 %	14.8 %	8.4 %	0.1 %	2.4 %	0.3 %	13.0 %	100 %

從第一卷四言詩摹倣《詩經》開始，到集內五古比率偏高，而且五律佔全部當中的最多數，完全與復古派詩文集的表現一致。復古派因為持著「取法乎上」的主張，並且對臺閣和蘇州文苑都有異見，因而他們的文集表現也與臺閣及蘇州文苑不同，側重五古與五律這兩種詩體，七律和七絕的比率則相對減少。

這個情況，不僅是上述鍾惺《隱秀軒集》，在譚元春的《譚元春集》裡，也有類似情況。¹⁷

¹⁷ 有譚元春《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旨齋詩草一卷》，(台北：偉文出版社出版，1976)。譚元春撰、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



詩體	四言	樂府	五古	七古	五律	五排	七律	五絕	六絕	七絕	合計
首數	11	50	166	60	268	24	68	70	17	55	789
比例	1.4 %	6.3 %	21.0 %	7.6 %	34.0 %	3.0 %	8.6 %	8.9 %	2.2 %	7.0 %	100.0 %

集中有四言之卷，摹擬《詩經》，而且五古及五律比率居於絕對多數，七律及七絕數量比率相對不高。與鍾惺的《隱秀軒集》，完全相同。

摹擬《詩經》是李夢陽、何景明在復古運動中的第一指標，鍾惺和譚元春二人的四言詩摹擬《詩經》，究竟透露著什麼消息呢？茲舉其詩篇，請參詳：

鍾惺〈維東有阜十首〉之首章：

維東有阜，維南有湖。阜則我宅，湖則我居。子無所往，我無所徂。我室子室，子廬我廬。¹⁸

三章云：

自南爾歸，有懷不一。子三適我，我不子即。子之適矣，如予之即矣。

凡讀過《詩經》的人，不難看出其摹擬的痕跡。

譚元春的〈華山五章，送鍾子也〉其二云：

將安將樂，其往有他。其往匪他，王事孔多。惕惕皇皇，孔多孔臧，不勞於行。¹⁹

不但詩的句式風格，明顯來自《詩經》，而且標題稱鍾惺為鍾子，與復古派彼此相稱的方式相同。

¹⁸ 《隱秀軒集》，卷1，頁1。

¹⁹ 《譚元春集》，卷1，頁4。



四言詩摹倣《詩經》，是復古派「取法乎上」的詩論中最重要
的實踐，因此，也是復古派和其前輩詩人的最大區隔。比如李東
陽，他認為最古的詩體，就是漢樂府，所以花了許多力氣擬樂府
詩，而有《西涯樂府》的示例。李夢陽不是不理會樂府，他也取
則古樂府，但是他更大的目標是向上取法《詩經》，在他的《空同
集》裡，《詩經》體居於首卷，何景明《大復集》也跟進，成為復
古派的鮮明旗幟。

鍾惺和譚元春集的首卷，也先列四言詩，和復古派的關係要
怎樣切割，怎樣畫分界限呢？現在一般市面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
史，都把鍾、譚兩人推入反對復古派的陣營，看到上述現象，能
不有所反省？

但是，檢視兩人的詩篇時，又有一個新的發現，儘管鍾惺的
《隱秀軒集》的詩體分布結構多麼像復古派詩文集，可是，從單
獨詩篇去閱讀時，卻沒有復古派詩集中常常出現的模擬漢、魏、
晉五言古詩的形貌。我仔細閱讀每一篇，可以認定這個結論。鍾
惺的五言古詩，相當隨興，甚至像是白話作文，連唐人的氣韻也
不要。

如果說黃汝一的詩集外形，具有臺閣體文集的特色，黃汝一
的詩篇趣向，也有臺閣體文集的共通特色，鍾惺的詩集外形，則
具有復古派特徵，遠離臺閣體特徵，他的詩篇內容，則不但遠離
臺閣體，連復古派也完全遠離了。

這個特徵，應是鍾惺在當代被視為獨立的竟陵派的原因。

三、從文集看作文趨向

《海月集》的文章，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性文章，
共有五卷，卷五是賦(3)對策(1)論(1)，卷六是書(29)，卷七是疏(3)
狀(1)啓(1)教(1)箋(2)表(1)頌(1)記(3)序(3)跋(3)，卷八是雜著(5)祭
文(18)，卷十三傳(1)墓誌(1)行狀(2)。²⁰第二部分是出使北京期

²⁰ () 中的數字是該文體的篇數。



間所作的〈銀槎日錄〉三卷，卷十是奏文及日錄上，卷十一是日錄中，卷十二是日錄下及記聞。

上述文章可分為三類，一是實用性強的書類和祭文類，所佔數量最多，一是與科舉有關的文類，一是其他文體，其他文體中，如狀啓教箋頌等文體，都是曾經出現在《昭明文選》的很古典的文體。

鍾惺的《隱秀軒集》，在統計之後發現，各體文章數量有：傳(5)，論有(29)（史傳人物論題佔了 27 首），序(57)篇（其中書籍序 9 篇，詩文集序 24，時義序 8，贈賀序 16）。記(8)，策(2)，表(1)，啓(1)，箋(1)，書牘(30)。佛教疏薦(13)，碑(2)，行狀(1)，墓志(7)，祭文(6)，題跋(32)，說(2)，辨(1)，書事(1)，偈(2)，頌(1)，贊(12)，銘(6)。

比較兩個文集，書牘、祭文這兩類應用性較強的體裁，黃汝一運用的比例較高，在鍾惺雖然也留下了很多篇數，但比例不及黃汝一。序、記兩類，《海月集》各有三篇，比其他只有一篇的體類，算是數量稍多的；在鍾惺的集子裡，記的數量不多，但序的數量很大，有 57 篇。從這 57 篇序裡，書籍序和詩文集序占了 33 篇，可見當時著作人之多，以及出版需求之高。至於題跋體，在海月集中有之，但鍾惺的比率更高。

這兩本集子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所用的文章體類很多，有許多體裁都是一類只有一篇、兩篇，這一點和明代人喜歡談文章辨體，應不無關連。

此外，《海月集》喜歡寫到和科舉有關的事務，以及朝鮮翰林院中的習擬之作，《隱秀軒集》則有許多時藝（時文）書籍的序，這一點也相同。至於《隱秀軒集》裡有許多佛教的篇章，與宋人如蘇軾等的文集，有相似的表現。至於黃汝一雖然經常讀佛教心經，但《海月集》中並沒有像鍾惺這樣，把包含疏薦之類的文章都收錄進來。

所以，總體來看黃汝一和鍾惺兩家文集，黃汝一是在尊崇《文選》的基礎上，追隨明代臺閣傳統的趨向穩定的文人，鍾惺則是



周旋在復古派與宋人之間，希望自己開創發明新形貌的充滿變化欲求的文人。

最後，再簡單比較兩人性格中的一部分：黃汝一喜歡海月，最後築海月樓而居，前後一貫。他描寫海月的詩篇，有長題如下：

七月既望，丹陽府伯金景受簡余同賞月，余畏暑辭馬，卻以漁船駕海而進。景受與亞使趙汝輝俱醉午酒不能起，萬戶金慶元攜琴娘侑秋露於船上。是夕，月色如海，海色如天，飄然有羽化登仙之興。夜闌臥，時有清飈，攬余頭髮，此外不知身在何境也。²¹

這篇詩題，有蘇東坡〈赤壁賦〉的風味，詩的首句，也有：「赤壁蘇仙夕」，所以，受到東坡影響，並無可疑，但是東坡所見是江月，汝一所處是海月，有更鮮明的隱退之趣。

鍾惺在〈自題小像〉中寫下：

萬曆丁巳（45年，1617），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²²

表面看，鍾惺自題的松下境界，具有傳統儒家高潔樂退的形象，與海月翁的理想境界相似，但是兩者的本質卻是不同，黃汝一的氣度穩定，而鍾惺則掩不住自喜之情。

四、黃汝一與袁宗道

前面談過，在明代文集中，如果拿袁宗道《白蘇齋類集》來和《海月集》比較，有兩方面的條件，比《隱秀軒集》更可接近。不過，我並沒有先選擇《白蘇齋類集》，在這裡才做補充。

²¹ 《海月集》卷2，頁21上，總頁48。按：「夜闌臥」中一字原稿不明。

²² 《隱秀軒集》卷41，頁595。



公安三袁的長兄袁宗道(1560-1600)，與黃汝一(1556-1622)的時代接近，兩人只相差四歲，袁宗道一生仕宦都在翰林館閣，這是明朝的官制使然，黃汝一也在考取進士後，進入朝鮮翰林院，由檢閱轉待教奉教，以後又曾任侍講院司書等職，都屬於館閣經歷，²³因此兩人的履歷也算接近，不過黃汝一有許多外任太守的經歷，是袁子所無。

袁宗道的《白蘇齋集》22卷，以分體排列，卷1、卷2為古詩，卷3、卷4、卷5為今體，卷6為絕句，各體詩的數量如下表：

詩體	五古	五律	五絕	五排	六絕	七古	七律	七絕	七轉	合計
數量	22	107	41	1	10	2	40	9	11	243
百分比	9.1%	44.0%	16.9%	0.4%	4.1%	0.8%	16.5%	3.7%	4.5%	100%

《白蘇齋類集》中有標學倣效李白的詩篇，也有多達十一首的七言轉韻體，但從詩集結構來看，五古、五律的數量遠大於七律、七絕，顯然有復古派的特徵。

雖然袁宗道出身翰林館閣，不過，傳統的臺閣中盛行以七律和七絕唱酬的風氣，在袁宗道的文集中並沒有太多習染。推究其原因，可能與當時復古派盛行，其影響力已深入臺閣中人，不無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在南華大學發表的〈論錢謙益《列傳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一文，已有討論。²⁴

²³ 《海月集》卷14，頁12上，總頁221，〈海月軒記〉(鵝溪撰)，首句即呼黃汝一為內翰，云：「內翰黃君，構小堂於馬嶽之下，名其軒曰海月。」

²⁴ 參見簡錦松，〈論錢謙益《列傳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南華大學：《文學新鑰》，93年7月，第2期，頁127-157。



讀者只要比較袁宗道和黃汝一的詩體分布，就可以知道兩人所承受的影響淵源的差異，十分明顯。在此不作更進一步討論。此處所注意到的是，黃汝一與袁宗道兩人，曾在北京見面。

這次會面是在萬曆 27 年 1 月 26 日（1599/2/21），袁宗道年已四十，從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修撰出身，時任太子右庶子。袁、黃兩人在早朝相見之後，袁宗道又與禮部主事黃大節、刑部主事張令聞二人同往使臣所住之處拜訪。次日晚間，黃光節到朝鮮使節團所居住的行館來，以袁宗道名義索買使節所帶來的朝鮮好紙好墨。《海月集》卷十一〈銀槎日錄·中〉記載了下面這件事：

（萬曆 27 年）正月二十六日丁未（1599/2/21），雪。早朝，主事（原註：提督主事，松案：乃禮部主事黃大節，字庭華，江西信豐人）與同年出身右春坊中允兼修撰袁宗道同坐正廳（原註：湖廣公安人。前例，主事必先見奏），臣等送奏稿及本部呈本，宗道參見，曰：「朝鮮誠心輔國，豈有此理」云云。²⁵

又云：

是日（同正月二十六日）主事爲刑部主事張令聞以天津抽分司將出去，故與袁同餞之。餞罷與袁修撰、張主事入來臣等寓館，徘徊良久，招李彥華問曰：爾行李帶來好品白紙與黃筆真墨否？對曰：小邦經亂，百物蕩敗，雖有些少纏帶，例皆麤薄難用。主事曰：不妨，我當酬價，不可白要，爲修撰爺欲覓故云耳。彥華下階叩頭曰：今日蒙老爺恩典，呈完奏本，不勝多謝。又告曰：陪臣等爲因國王橫被冤枉，欲將痛迫情事，呈文於禮部、兵部及閣老、科、道、都察院諸老爺前，望老爺一一出票，許令往來，不勝惶懇之至。主事曰：知道。²⁶

又云：

²⁵ 《海月集》卷 11，頁 2 下，總頁 167。

²⁶ 《海月集》卷 11，頁 3 下，總頁 168。



(二十七日)日晚，主事來館，行相見禮，再拜退。俄而小甲紀大材來言前日所求紙筆墨。臣等即以紙十束、墨二十笏、筆五十柄付李彥華送之。主事又以白銀八箋酬之。彥華辭之曰：「土物不關而老爺給價，陪臣必不受，小的安敢持去。」主事曰：「俺欲送于袁翰林，故爲此給之。你若不受，則恐不諧與袁之約。」仍曰：「後日使行，絕品好紙好墨，倘不可得來否」云。²⁷

文中「行相見禮」，是明代士大夫的禮儀習慣。明代嚴於主客之禮，即使在國內一般士大夫間也行相見禮，所謂「相見禮」，記載於《儀禮》一書，依據書中所載，客人在依禮相見之後，必須退於門外，再遣隨從(即文中所稱小甲的紀大材，小甲猶言小价)，索取紙墨和筆，送給銀箋，使臣一方則由驛者李彥華回復，雙方都由執事之人彼此傳話及遞送物品。所以，這次袁宗道並沒有和黃汝一等使臣們見面。但黃大節主事親自登門索取，而且一再稱說如此做而且要付錢的原因，是爲了袁宗道。

同書又云：

二月初七日丁巳(1599/3/3)陰，…日晚，黃主事大節坐行臺，臣等令李彥華告曰：…。請出票帖，即出給之，又送銀箋求買紙筆，稱袁翰林欲得之，以紙五束、筆十柄送之。²⁸

這一次使臣到黃大節的辦公室來，黃主事又自稱爲袁翰林欲買紙筆，所以使臣們又送出了紙五束、筆十柄。到後來：

臧郎中(主客司郎中臧爾勸)差人賚銀箋來求紙筆，行李已竭，不能優酬，可愧。²⁹

上述的記載中，明顯地對袁宗道暗寓著不滿，所以兩次記載了袁宗道的索買之後，還說當其他官員(如主客司郎中臧爾勸)來向使節團索買時，手頭上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復命了。

²⁷ 《海月集》卷 11，頁 10 下，總頁 171。

²⁸ 《海月集》卷 11，頁 20 上，總頁 176。

²⁹ 《海月集》卷 12，頁 11 上，總頁 186。



黃汝一專舉袁宗道來談這件事，也許只是就事實而記載，也許是因為袁宗道的翰林身分，或者他當時的名望比較大，所以特舉他來做例子，不得而知，但這兩位文壇才子見面，卻以這樣的經驗交往，實在令人錯噩。

這年袁宗道四十歲，次年就去世了。這時他已經很有名氣，成為公安袁氏的領頭人物。本來，像袁宗道這樣在文壇上享有大名的人，有可能在和黃汝一的見面中，筆談一些文學上的見解，對外國來的客人有所影響，但直到黃汝一等人離開北京，歸往朝鮮，兩人並沒有就文學話題做過對話。換言之，看不到袁宗道對黃汝一發生什麼影響。³⁰

當然，以使者的任務來說，使者在北京期間的每一次拜訪，都必須經過票許，相當不自由。黃汝一只是重要隨員，既非正使，也非副使，行動更不自由。³¹但是，袁宗道的同年好友黃大節，恰好是這次使節團的接待人，負責使節團行動的協調和核允給票工作，可以隨時到使者所居住的館舍中，和使節團中任何一人見面，他也確曾帶袁宗道與黃汝一見面。因此，這兩位都是熟悉詩學的人，卻沒有擦出詩文的學問的火花，令人可惜。而且，兩人關係以袁宗道向使節團索買好紙、好筆、好墨而發展，確實令人難堪，擺不掉不好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袁宗道的研究，都認為袁宗道是公安之學的發起人物，然而來訪的客人，這位黃汝一身為朝鮮著名的詩人才子，也在他的〈銀槎日錄〉中抄錄了袁宗道的籍貫（湖廣公

³⁰ 袁宗道的論學文字，至李德懋（1741- 1793）《青莊館全書》，卷53，〈耳目口心書〉中，方見引用。至於袁宏道（1568- 1610）則有朴泰輔（1654- 1689）《定齋集》卷1，a_168_014d，有〈和袁宏道項羽廟- 代人課作〉一詩，題中既有「代人課作」，可見當時袁宏道死後不久，其詩已傳至朝鮮。

³¹ 據《海月集》卷10，頁10上，〈銀槎日錄〉所載，此行為萬曆26年戊戌10月21日癸酉（1598/11/19）自漢城出發，同月29日至平壤，12月6日渡鴨綠江。萬曆27年己亥4月24日（1599/5/18）渡江，回至義州。此行的正使是議政府右議政李柏福，副使是工曹參判李廷龜。此行也，李柏福（白沙）著有《朝天錄》載其事。



安人)和官職(右春坊中允兼修撰),也知道袁宗道與黃大節是同年,然而,對袁宗道發起公安之學的文壇名望,卻似乎並無所知,這項事實,應是研究公安者的重要史料。

五、個別事例在《海月集》

《海月集》對於中國的學者,可以說是很新的罕見材料,因此,我在閱讀此書時,覺得有些內容保留了很好的明代文學史料,值得向讀者推介,以下將分點敘述:

1、關於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出版後,如何使用,資料尚不多,我檢閱明人文集,僅在王格父子的書信往來中,³²知在翰林庶吉士月課中,必須使用《洪武正韻》,在《海月集》中,又得到如下材料:

書子臨書頭辭之際,問曰:「席藁字,何無草頭?」彥華對曰:「我國字書一從洪武正韻,想正韻如是書之矣。」官員不問,云云。³³

彥華即李彥華,使節團中通華語者。

2、關於祭孔和文廟

《海月集》卷11,頁20上云:

二月初七日丁巳陰,先師釋奠,以此各衙門不坐。

明代對孔子行春秋二祭,即仲春與仲秋的上丁,行釋奠禮。朝鮮亦同,所以黃汝一記載了這一天北京因為祭孔而放假,不坐,即是辦公室不上班之意。

³² 王格曾授庶吉士,與董其昌同學。在庶吉士時常與父親多次通信,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385,有〈王格〉條:「嘉靖初,唐應德、屠文升輩倡為初唐詩,汝化(王格·庶吉士)亦與焉。」

³³ 《海月集》卷11,頁3下,總頁168。



非常巧合的是，黃汝一在朝鮮王京時，正好遭逢明朝使臣朱之蕃到來，並且參加朝鮮文廟的重修落成活動，雙方有詩酬答。

朱之蕃偕副使梁有年奉使朝鮮，在萬曆丙午（34年，1606），其間正值文廟重建落成，黃汝一是年四十一歲，在《海月集》中，正好留下了雙方贈答的詩篇。

黃汝一〈次上天使朱之蕃韻〉詩：

中夏儀文際海繁，泮宮星彩爛盈門。彝倫有賴留華扁，禮樂斯興揭格論。澤遠千年嗟聖遠，道存今日喜師存。環橋聳聽知趨正，免被冥行誤觸藩。（夾注：時兩使謁聖於泮宮）

朱之蕃原詩

廟貌更新杏檜繁，踴躍多士集橋門。八條遺澤遵箕範，六藝根源溯魯論。道不遠人期慥慥，靈含成性在存存。相期願學先時習，扶植天常壯翰藩。³⁴

朝鮮文廟，今尚存，在首爾市成均館大學校園內，規模宏大。文廟即孔子廟，依明代規制，應稱廟學，廟指文廟，學指儒學。廟學有兩種規制，一為左廟右學，一為前廟後學，首爾的廟學，為前廟後學之制。儒學明倫堂上的題匾，即出於朱之蕃，上款為萬曆丙午孟夏之吉，下款為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欽差正使金陵朱之蕃書，中為明倫堂三大字。

³⁴ 《海月集》卷2，頁21下，總頁48。





下面是從 Google Earth Pro 下載的文廟衛星地圖，圖中的數字，在下面附加了說明。



首爾文廟Google Earth衛星地圖

- 1 大成殿，即文廟主建築
- 2 明倫堂，即儒學主建築，朱之蕃題匾在此。
- 3 西齋，儒生宿舍
- 4 東齋，儒生宿舍
- 5 西廡，從祀神位
- 6 東廡，從祀神位
- 7 祭酒府(守僕廳)與宰牲所、典祀廳、祭器庫相鄰
- 8 東三門(御三門)，國王春秋兩祀時由此出入
- 9 儒學入口，平時出入
- 10 饌堂(進士食堂)



- 11 六一閣（大射禮）
- 12 成均館大學校門
- 13 成均館儒道會首爾本部
- 14 神三門

圖中所見首爾廟學，廟在前—大成殿（建物中心位置地理座標為 37°35'7.85"北，126°59'45.90"東），學在後—明倫堂（建物中心位置地理座標為 37°35'10.33"北，126°59'45.17"東）。大成殿的建築高度，高於明倫堂，符合明代儒學的習慣。圖中所見，周圍約 580 米，面積約 1.5 公頃，朝鮮王朝時期，成均館的面積比現在還大許多。成均館為國子學的層級，朝鮮國內尚有 329 所鄉校（即府州縣學）。

大成殿前方的庭院中以松樹較多，大成殿後方和明倫堂中間庭院有 5 百年的銀杏樹二株，³⁵與明代朱之蕃所稱「杏檜繁」的略相似。大成殿的正門稱神三門，門外是成均館大學的校內道路。

兩廡莊嚴寧謐，建物長度比明倫堂的東西兩齋略小，相差約 10 餘米，東西兩齋的建築目的，是作為容納學生的號房；號房每間都不大，韓式木造地板。這些房舍過去是成均館儒生宿舍，約二十年前，仍提供給成均館大學研究生住宿。東齋外有進士食堂（饌堂）。

因為成均館是國學，首長為祭酒，所以區內有祭酒府（守僕廳）。宰牲所及典祀廳都距祭酒府不遠，其他，藏放圖書的尊經閣和放置大射禮器的六一閣，尚都還在，御三門和下輦台等等，都仍舊規，可與明清的廟學參證比較。

³⁵ 傳為 1519 年（朝鮮中宗 14 年）大司成尹偉所植。



3、明代朝議案例

黃汝一隨二使入京的任務，是因為倭寇侵朝事件中，明朝東征軍的丁應奉認為朝鮮國王勾結日本，引日本入侵的目的，在於圖謀恢復朝鮮在遼東的古領土。國王為了辯誣，派使者攜帶奏文，到北京自清。

在這件艱難的出使任務中，《海月集》記載了明朝政府針對朝鮮國王辯誣事件的會議過程——雖然在卷十二記載著兵部蕭尚書婉拒提供會議紀錄，³⁶但《海月集》中仍然備載是次會議中各部大臣的發言內容。這項記載提供了明代對於重大事件各部會議的組織，參與人員，以及會議前後的處理方式，對了解明代政治運作，頗有幫助。

這件事情，聖旨所指定的論政範圍是：

二十九日庚戌（1599/2/24）晴，朝畢得見通報，已於昨日奉聖旨，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看議了來說。臣等以為若此則五府六部九卿六科十三道諸官處，必須一一呈文。...晝夜繕寫四十餘道。

實際上在會議中發言的有：

後府都督掌府事定國公徐文壁

右府都督僉事彰武伯楊世階

中府掌府事靖遠伯王學禮

前府掌府事永康侯徐文煒

吏部尚書李戴

戶部尚書楊俊民

³⁶ 《海月集》卷 12，頁 27 上，總頁 194：「三月十四日癸巳（1599/4/8），尚書曰：我與同僚相議，則朝廷文書，私自抄出，傳送外國，體面非輕，既有咨文，又寫另單，似涉非便，你將此語傳說陪臣，則陪臣自然知事體如此也。」



禮部左侍郎余繼登

工部尚書楊一

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

通政司使范崙揭

大理寺卿甘士价

吏部給事中趙完璧

戶部給事中包見捷

禮部左給事中劉餘澤

兵科給事中桂有根

刑科給事中楊應支

工部都給事中韓學信

浙江等十道御史趙士登

共十八人發言，從發言的順序，可以看到各個辦公室，及官屬尊卑差異，也看到參與人員範圍十分廣泛。

4、關於余繼登

朝鮮使臣爲了爭取支持力量，爲達成國王交付的任務，對明朝大官的觀察，十分仔細。其中最有趣的是談到余繼登的事：

蕭（兵部蕭尚書）意以禮部非但該掌外國，又余侍郎（禮部左侍郎余繼登）方擬閣老重望，恐主張廷論故爾。³⁷

³⁷ 《海月集》卷12，頁12上，總頁176。按余繼登於萬曆26年（1598）6月以禮部左侍郎署禮部尚書，27年（1599）年5月升任禮部尚書，通常，禮部尚書即可入閣，其時閣員張位於26年6月罷黜，趙志臯入閣時年已七十餘，自26年10月病痺在告，閣中只有沈一貫，因此，余繼登入閣的呼聲很高。從黃汝一的敘述，可見使臣對中國



又云：

臣等再往禮部朝房門外，則吏禮部官與蕭尚書以下諸官於門外交揖，分左右列立。臣等趨進階下，欲有所陳，余侍郎繼登色甚不平，麾使退去。臣等不敢開說而退。³⁸

兩件小事，呈現了余繼登在入閣前的情狀，在同僚間地位的微妙變化，也十分傳神地把余繼登的性格一角顯露了出來。

5、滿州人

《海月集》也寫到了滿州人興起，遼東的不安定，以及明朝應變之方。在卷九〈詩〉及卷十與卷十二的〈日錄〉中，因為多記出使途中之事，對於滿州人的興起，明朝的處置，旅途中的不安，著墨甚多，文中也深深表達了朝鮮對滿州人的疑慮。尤以萬曆 27 年 1 月 22 日（1599/2/17）所記，令人印象深刻：

韃子一名適來臣等寓處，能解我國語言，即令隨行軍官羅紘就盤問。…觀此所言，不可的信，而亦有關於軍機，故錄其大略。³⁹

中間的問話頗長，是針對滿州老乙哈赤及小兒哈赤兩兄弟的武裝實力，對遼東各部族的影響力，以及對朝鮮的威脅性等各方面的對答，文長省略。

另一件，是黃汝一在回程時，遇到多起明朝所派往朝鮮的軍隊，也有很多生動記載。事實上，在黃汝一出使歸來後不到十年，滿州人已經成爲遼東最大的威脅。在黃汝一的疑慮中，看到事件的端倪。

在卷十二最後的〈記聞〉中，他寫道：

的政情十分熟悉。余繼登本傳，見《明史》，卷 216，頁 5701。

³⁸ 《海月集》卷 11，頁 18 上，總頁 175

³⁹ 《海月集》卷 10，頁 36 下，總頁 165- 166。



天災時變，通古所無。皇極災，乾坤兩宮又災，⁴⁰黃河中渴，太山中裂四十里。⁴¹寵開刑人，監收店稅，⁴²天下騷然，賄賂公行，有識退藏。皇長子，李妃生，為人鬆。陳妃又生一子。次子鄭妃生，鄭妃蘇州人，專寵後宮，子亦稱賢，上頗欲爲副，以此未立東宮云。禮部右侍郎朱國祚訓之云：大起乾坤之役，徵斂無藝，天下稱之曰：朝廷爺愛銀不愛民。又民間奢侈成風，虛文日增，所見多有隱憂，嗚呼歎哉。海寇楊一龍又叛，⁴³南邊不靖，北撻又盛，再見僨將之辱，北境可慮。⁴⁴

從文中提到禮部右侍郎朱國祚訓之云云⁴⁵，可以確定這段紀聞的寫作年代，是在這次出使中。這段記聞的內容很多，包括了

⁴⁰ 皇極災指二十五年六月戊寅，三殿災，火起歸極門，延皇極等殿，文昭、武成二閣，周遭廊房，一時俱燼。見《明史》卷29，頁467，〈五行志二〉。乾坤兩宮又災，應是萬曆二十四年三月事，在此之前。見《明實錄》，卷311，頁5810，〈萬曆二十五年六月〉條。

⁴¹ 黃河中渴事，不詳。泰山事，指萬曆25年（1597）6月泰山崩之事。見《明史》卷30，頁506，〈五行志三〉。《明實錄》，頁5823，〈萬曆二十六年七月〉條載：「馬從聘言近日泰山崩，相離一里有餘」，與黃汝一所載不同。此事，明人歸因於開礦，故《明史》及《明實錄》所載極簡略，黃汝一所聞，可以補其不足，不必因所述差異而以為傳聞有誤。

⁴² 此指神宗時礦稅之害。明神宗任用宦官監礦稅，所至橫暴，內外臣僚諫奏不已，而終神宗之世，不能禁止。

⁴³ 海寇楊一龍事不詳。

⁴⁴ 《海月集》卷12，頁37下，總頁199。

⁴⁵ 朱國祚（1559-1642）字兆隆，秀水（今浙江嘉興）人。萬曆26年（1598）7月，朱國祚被擢為禮部右侍郎。28年（1600）七月余繼登死，國祚代理禮部尚書，為定皇儲上疏數十次，最後終於被採納。在內憂外患之際，提出“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監獄”等主張。不久升為禮部左侍郎，改吏部。文中稱朱國祚為禮部右侍郎，可見本文作於萬曆26年戊戌（1598）10月至27年己亥（1599）3月的出使期間。



不少天災和人禍，而其核心的問題，仍是在皇帝，對於明代萬曆朝的歷史，以及明代滅亡的遠因，都有值得深入再研究的價值。

六、結論

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乃在探索中韓古典文集比較研究的方法，在研究之前，並沒有主觀賦予的成見，因此，主要是以呈現之法，顯現出兩家文集的同異，並且把它們放在明代文壇現象的平臺上來觀察。

通過比較黃汝一《海月集》和鍾惺《隱秀軒集》的結構，可以發現黃汝一的詩文趨向，是採取明代傳統的臺閣為主導的風習；而鍾惺則明顯受到復古派的深切影響。不過，鍾惺從復古派深入進去之後，再走向新創的道路。本文也同時比較了譚元春和袁宏道的詩文集，發現二人同樣都受到復古派的習染，同時也發現他們走向改變的意圖，可以相為參證。這一層變化，對於研究晚明及清初的詩文者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重點。

其次，我也注意到〔朝鮮〕黃汝一《海月集》中記載了許多關於明代文學及其他事務的零星史料，例如黃汝一曾與袁宗道會面，對袁宗道形象也有所記錄，這些內容都是明代本土資料所沒有的，本文以選錄和說明的方式，將其中幾件提出來，放在第五小節，供學界參考。將來如果能廣泛收集，一一持與中國典籍參校，將是很重要的一條研究路線。



引用書目- 依出現先後

- 〔明〕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朝鮮〕 黃汝一著，趙昌來標點，吳虎泳監修：《海月先生集（簡稱海月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即韓國古典翻譯院前身，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集，2005）
- 〔明〕 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明〕 袁宗道撰、錢伯城標校本 《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見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9）
- 〔明〕 李東陽撰：《懷麓堂集一百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0冊。1983）。
- 〔明〕 李東陽撰、周寅初點校：《李東陽集》（長沙：岳麓書社，1984。）

